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六七期 ——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11c)

【书刊评论】	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 ——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大草原》	茉 莉
【拒绝遗忘】	《我们忏悔》前言	《我们忏悔》编委会
【亡灵祭坛】	“反动权威”胡传奎之死	张阿妹
【往事追忆】	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选载之三）	米鹤都
【研究评论】	“文革学”的三大泡沫	韩少功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书刊评论】

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大草原》

• 茉 莉 •

当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巴黎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所描写的内容。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作为外族强权对波兰人的残暴奴役和压迫，尚未为世界所知晓。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因此一度被人视为“疯子”。

现在我手里也捧着这样一部书稿，一部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之作——《没有墓碑的大草原》。人都有趋乐避苦的倾向，为了一种责任感，我艰难地阅读这部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痛苦的著作。此书真实地揭示出文革那个噩梦般的时期，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怎样被中共大汉族主义者统治的“伟大祖国”所吞噬，泯灭在极权主义的铁腕之中。

原本丰美的内蒙大地，渐渐失去了它鲜艳的色彩，而代之以一副黑白色的悲哀画卷：黑色是内蒙文革大屠杀的恐怖记忆，白色是无数受难者的骨骸。四十多年前内蒙民族的苦难命运，像尖锐的锥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灵。面对这一部活生生、血淋淋的内蒙民族史，身为汉人的我

们无权选择失忆，我们只能在心灵震撼之后，去和蒙古族的作者一起反思，去探寻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去追究造成这个惨绝人寰悲剧的制度性根源。

◇ 命运交给一个五岁小男孩的角色

内蒙大草原上没有墓碑，用文字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人党”受难者铸刻一座精神墓碑的，是出身于内蒙古鄂尔多斯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2011年，杨海英教授在日本大阪接受第14届“司马辽太郎奖”。该奖奖励他“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迫害屠杀原著民族蒙古人状况”。在杨海英的微笑后面，是内蒙的蒙古族人从未痊愈的深重创伤。

这部《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写作，源自一个五岁小男孩的遭遇。童年的杨海英家门前有一条大路，那是乌审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4？1968年到1969年的文革动乱时期，那条大路成了一条“亡灵回家之路”，络绎不绝的蒙古人带着他们被杀害的亲人的遗体 and 遗骨，悲伤地回乡归葬，路过杨海英的家，大都要寄宿一晚。杨海英的母亲板瓦尔按照蒙古民族相互济助的传统习俗，满心悲怆地接待来自各地的同胞过路人。

五岁的小男孩不仅亲眼目睹了众多同族人的无妄之灾，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是内蒙文革的受害者。杨海英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划分成“剥削阶级牧主”，因恐惧被逮捕入狱而逃亡。高龄的祖母被揪去日夜接受“群专批斗”。母亲和幼小的他被驱赶出家门，寄身于破旧的仓廩，甚至被剥夺游牧民族的基本生存权——放牧牲畜。

正如米沃什的诗句：“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 在那里脚会踢到 / 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从小就成为民族与政治双重的贱民，杨海英深感人为刀俎，蒙古人就像是待宰的“春天的羊羔”。1989年3月他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从2004年起，杨海英在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任教授，主要研究蒙古民族学。

那个走出蒙古包的小男孩对得起他所遭受的苦难，长大后，他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做一个杀戮时代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在大部分蒙古人被迫沉默噤声之时，杨海英以研究本民族的苦难历史为终身使命。他采访了许多内蒙古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作为见证的第一手资料，用以探索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人的大屠杀中仍属忌讳的人道犯罪问题。

在接受该书的汉语译者之一的刘燕女士采访时，杨海英介绍说：“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十余年光阴的隧道。从1991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2004年采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采访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 十四人的故事透视整个民族命运

那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时代。几乎每一个蒙古人的家庭都有被捕被监禁的亲人。杨海英在他周围的亲友中，找不到没有在文革受过迫害的蒙古人。这个世界充满了无辜的毁灭与牺牲，但只要无人出面作证，纵然有很多人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仍然不会为人所知。

因此，这位勤奋努力的蒙古族学者所做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让蒙古人的苦难有出声的机会。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采访过很多幸存者，该书重点介绍的是其中的十四位。这些人代表

内蒙文革中各个阶层和不同派别。

这十四位蒙古人，除了杨海英的母亲之外，还有：曾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的图布信，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特古斯，蒙古族名医金久斗，师范学院蒙古人造反派哈拉夫，内蒙师院教授林色，草原造反派忽日勒巴特尔，鄂尔多斯蒙古贵族家庭出身的奇琳花，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原图克公社书记策·哈斯毕力格图，失去全家亲人的其莫斯仁，革委会主任额尔德尼，“抗日作家”乌兰巴干，“延安派”干部奇治民。

这十四位蒙古人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身份地位。他们中有的是从当年的满洲国东渡日本留学的民族精英，被称为“挎洋刀的”，有的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延安民族学院的蒙古族青年，被称为“根正苗红的延安派”；有的出身于蒙古贵族王公之家，有的是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土改干部；有的在文革中当了造反派，有的进入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也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著名作家诗人，有的只是普通牧民。

无论这些人的背景、立场如何迥异，他们都是蒙古人，因此大都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其中不少人被以“内人党”、“右派分子”、“日奸”、“蒙特”、“乌兰夫的走狗”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严刑拷打，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在迟暮之年给作者叙述了自己刻骨铭心的往事。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涉及内蒙的广大民众，从而透视出整个民族的命运。

此书在历史的记忆中给了众多死难者一个确定的位置。最让笔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

杨海英的母亲曾伤感地告诉儿子说：“我们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蝼蚁啊！”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在接受杨海英采访后指出：“中国的政治运动是一架巨大的阴谋绞肉机，它毗牙咧嘴地将几乎所有人都卷入进去，都被它惨烈地绞成肉末。”

◇ 每一份记忆都揭示大屠杀原因

然而，为什么如此惨烈的大规模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呢？这几乎是该书作者和被采访者都在询问的问题。在大劫大难过后，蒙古人从不同的角度，长久而痛楚地思索和探究。

此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每一份回忆，每一次讨论，都是答案的组成部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大屠杀之根源。例如曾参加过造反组织的林色对杨海英说：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内蒙开始的。内蒙在全国率先被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日趋激烈的中苏对立中，毛泽东早就考虑到与‘苏蒙二修’不可避免地终将一战，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毛泽东是一个疑心重重、弓杯蛇影的人，当然他事先要肃清缺乏忠诚心的内蒙人，先手为强，除去心腹之患。内蒙距离北京仅几百公里之遥，与‘二修’陆地接壤，打起仗来，内蒙为战略要塞之地。”

除了从地政学角度分析这场大屠杀之外，被采访者还揭露了一些汉人的言论，证明文革中对蒙古人的杀戮既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源于汉人对蒙古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例如，曾直接指挥屠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说“我见蒙古人就恶心，把锡盟老蒙古全挖光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把蒙古人百分之百打成内人党

没错，这些家伙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死一个少一个。”

内蒙古地质勘探队革委主任李国道提出的挖肃口号是：“一网打尽蒙古佬！”强暴蒙古女性的汉人打手说：“殴打你们蒙古鞑子个个都是分裂祖国的反革命，你们的婊子由老子想怎么操就怎么操！”“蒙古鞑子没一个好的，打死了还怕没地儿埋，笑话！”

上述文革中的汉人言论，与清末金丹道“灭尽蒙古鞑子，杀人腾地”的口号有相似之处。“金丹道暴乱”曾在10余天内杀害蒙古人数万之众。此书中哈斯毕力格图作证说，在内蒙古“挖肃”运动中充当打马前卒的汉人，还返回陕西呼朋唤友，抢占蒙古人的土地。这就揭示了内蒙古大屠杀的另一原因：攫取土地。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内蒙屠杀是符合中共汉族政权的利益的，被中共高层视为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杨海英的著作中搜集了大量的中共文件。即使是承认“肃清内人党扩大化了”的中共总理周恩来，也基本上肯定内蒙屠杀：“内人党有没有？有。是有根子的，只是没那么多，有老的，有新的……内人党同外蒙接触的，是反革命。”

作为研究蒙古民族学的专业学者，杨海英不能只有详实的资料，他还必须从事实出发，一步步展示大屠杀的前因后果，结合时代政治背景和民族学理论，从根本上剖析为什么这样残忍的大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

杨海英的看法是，内蒙古发生大屠杀的本质是：具有优越感的“文明的、先进的汉人”对“远离文明轴心、黑暗落后的蒙古人”的歧视结构，在极权主义国家内，发展成为消灭“劣等种族”的杀戮行为。他认为，内蒙文革从根本上与汉地文革性质迥然相异。文革中蒙古人的遭遇并非源于左倾错误，而是一场有组织、有准备、蓄意而为的民族清洗。这不只是一场上层政治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公然违背了1948年《灭绝种族公约》的“反人类罪”。

◇ 汉人的良知与该书的争议性

《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中文版将于今年11月1日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原文为日文，将此书上下两卷译为中文的刘英伯先生和刘燕子女士，都是中文语言功底极好的学者。身为汉人，他们父女俩铁肩担道义，怀着“我们对不起蒙古人”的负疚心情，耗费两年的时间心血和汗水，使我们能够读到行云流水般的准确而精致的中文版。

杨海英在此书中多次提到锡伯族学者吴迪（笔名启之）的贡献：“北京电影学院的吴迪教授曾是从北京下放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他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记录中云北峰的故乡、土默特左旗北什轴公社的‘挖肃’之惨烈实态。”

刘英伯、刘燕子和吴迪等非蒙古族人，以普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去关注内蒙受难者的命运。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经呼吁“一个声音、一个力量，理性与了解的力量”。只有对他民族具备这种理性和了解的力量，我们才能获得判断历史与现实的能力。

笔者可以预测，这一部涉及重大主题、言辞犀利的著作在出版中文本之后，必将引起争议。一个多年来失去声音、被同化被边缘化的民族，突然有人为之发出如此尖锐、如此严重的指控，势必遭遇到一些先入为主的定论的拒斥。同时，杨海英关于内蒙文革的性质是“种族灭绝”的观点，也可能会遭遇到学界中人的质疑。

作为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学者，杨海英在他的宏大著述中，也许会在其他某个领域如中国政

治、国际关系方面有力所不及之处。作者有自己强烈的爱憎，这种受害者情感也会影响历史学需要的平实冷静态度。他的叙事背后所显示的一些假设和框架，也会有可讨论之处。

但是，这部作者含辛茹苦撰写的著作，诚实记录了一个民族走向毁灭的过程，承担了揭露伤口、书写痛苦的责任，为一个黑暗时代填补了空白。无论有何不足，它仍然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作品。

按照尼采对历史的分类，杨海英这部内蒙文革史应该属于“批判性历史”。尼采认为，对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而言，他们批判历史，是为了现在能够生活。批判性历史试图从历史中学习，它拒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一类的犬儒主义态度，力图使灾难不再循环。这样的历史描述过去，更着眼于我们汉蒙两族的未来。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十一月号，发表时有删节，本文为未删节版

~~~~~

## 【拒绝遗忘】

### 《我们忏悔》前言

•《我们忏悔》编委会•

一段“文革”已似过眼烟云，一场浩劫已经事如春梦。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种罪责始终重压。那就是我们不曾讲述的“文革”经历，不愿否定的青春年华。为了珍惜过往的年轻，为了守护曾经的真诚，我们一直掩饰自己，直到掩藏了为害，掩盖了历史。终于，公众记忆中，没有了我们的罪过；历史谴责里，只剩下个“王张江姚”。

对“文革”的无知，直接影响对历史的解读。刚刚过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为弄不清那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风大浪湮灭了多少人性良知，于是，非亲历者以为那场“伟大革命”有“历史合理性”，亲历者也有人依旧鼓吹“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如果继续剥夺对真相的回忆，同样的真相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从社会灾难中找出“合理性”，同样的灾难就一定重复发生。

我们确实有过真诚激情，我们当真以为目标高尚。但是，我们对什么真诚？我们看什么高尚？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忽然敌我分明；青春年少的花季，我们转眼虔诚迷信。同样是人，我们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是友，我们撕裂成对立阵营。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烧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征途。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有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我们强制乡亲“割自留地尾巴”，无异于给饥饿光景雪上加霜；我们鄙视村中“地富反坏”，等同于在惶惶乱世趁火打劫！

那时，我们真诚地贯彻了“最高指示”，站在了“敌人”之上，却不知，竟让无数人蒙冤受屈、忍辱负重。我们高尚地保卫了“红色江山”，接近了“伟大”目标，却不料，竟交出了人性

的意志和灵魂。

为什么对简单夸大的阶级斗争，我们没有过怀疑？为什么对人多势众的群众运动，我们没静下思考？为什么在群体的狂热中，我们失去自我？为什么在崇拜的偶像下，我们满眼敌人？为什么我们会头脑简单、观念极端，任它深刻而痛苦地伤害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面对“文革”时，我们是否问过一句为什么？哪怕是仅仅一句……

我们为什么没有问过为什么？

丧失思想能力的青年时代，真能有宝贵的青春价值？失去自我意识的群体迷幻，还能值得“青春无悔”？那时，影响我们想象力的，并非事实，而是信念。信念成为断语，便一夜普及；信念成为迷信，便强大如斯。我们以为揭开了幸福的秘密，其实不过是妄想；我们以为投入进伟大的事业，其实不过是膜拜。我们陷入群体幻觉，对强权卑躬屈膝；我们失去人格意识，对个人唯命是从。我们服从别人怂恿，深信自己肩负使命；我们感觉群体强大，专横推行简单教条。一个群体目标，取代了我们的所有理想；一场想入非非，替换了我们的所有幸福！事实上，只要效忠个人，我们便不会辨别真伪，立刻失去个性；只要感情狂暴，我们便没有推理能力，变成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的精神统一于一家，我们就一定会拒绝讨论，而用言行暴力去伤害别人。那种排斥一切的平等精神，对自由和个人生命价值视如无物，毫不尊重；那种为信念和领导者而战的大众民主，只可能对非民主制度五体投地，无限忠诚。于是，我们成为被制造的人民意志。而人民呢？人民在这种意志下蒙受苦难！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多年以来，我们没忘记自己曾为害他人，没忘掉自己曾愧对他人，在心中一次次否定那些行为。但我们也一直回避它们，怯于面对，羞于启齿。然而，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不敢面对，说到底还是没勇气建立人性良知。谁都不愿意咀嚼吞咽记忆的苦果，谁都不情愿剖剥撕扯良心的谴责，但以人性反思，我们觉得，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因此，我们才懂得：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我们曾问自己：“有什么可忏悔的？”我们本来就是“文革”受害者，“文革”带来的无尽恶果，至今无数人仍在承受。“文革”不是我们发动，极左不是我们创始——忏悔，是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良心责任，而我们只是听命，无权选择——他们不忏悔，我们忏悔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制造社会、文化浩劫的权力者，从无忏悔，尚无先例。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忏悔不忏悔的问题，只存在历史评判的问题。而在我们，忏悔，是良知的自觉，是人性的升华。由此，宝贵的人类文明经验——宽容和宽恕，才不会失去价值。我们忏悔，社会一定更宽容；我们忏悔，人类可以更宽恕。

个人良心需要我们忏悔。乱世中不是所有人都有过分之举。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们的暴力行为、不齿行为，使我们成为事实上的“文革”积极分子——罪过参与者。而我们更可能从中发泄，出头表现，“靠拢组织”，牟取利益。我们的更积极，更冲动，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扪心自问，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社会后果需要我们忏悔。像当年的德国青年服从他们的“元首”一样，我们投身侵犯自由的客观后果，伤害了别人，伤害了社会。我们作为“文革”受害者，认为发动者应该负责；我们作为“文革”加害者，自己就无须承担责任？！道德罪过关系到个人的言论和行为方式，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越是受害者不向我们提出责任要求，我们就越是扪心自问：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将心比心，能不道歉？！

政治责任需要我们忏悔。我们曾经狂热拥戴，支持极权不法，支持破坏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政治责任关系着公民赋予政权及其行为以合法性，是每个公民都推卸不掉的责任。有了我们原始般的“三忠于四无限”，专断强权才可以肆无忌惮。扪心自问，作为谬误的土壤，我们应该追究总结。

文化责任需要我们忏悔。即使是被迫的、无能为力的，我们都对那时的“屈从权力”行为负有责任。因为，我们继承发扬的，是皇恩浩荡、感恩戴德、君命如天、血报皇朝、皇权长久、圣寿无疆。这都是些什么？扪心自问，我们应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什么？

历史责任需要我们忏悔。今天，我们有了比较、辨别文明和反文明的能力，也就有了对人类、对后代做出交代的能力。即使罪不在我，但我们曾经经历，曾经错误。灾难亲历者的应有责任，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抑制群体狂热行为，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无法为害的文明制度。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让未来不重蹈覆辙。因此，扪心自问，我们有必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对曾被玷污的历史，大声地说：对不起！

罪过的历史必然是苦难的历史，不应该无影无踪。集体无意识必然犯有集体罪过，不应该毫无罪恶感。我们的青年时代一度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人格一度葬身于“文革”。

“文革”中，我们也曾经“忏悔”，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为信念的胜利而决心献身，是群体无意识的自大狂妄。那种面向强人秩序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在任何有违“最高指示”的思想言行都可以成为罪行时，那种忏悔是极权与迷信统治的工具。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承担责任了，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我们轻松地成为了免除责任的无名氏。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如果用年轻的真诚为自己辩护，我们就永远不知自己曾经良知泯灭。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我们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忏悔，本质上是个人心灵行为，是敞开胸襟，与灵沟通，是进步和文明。忏悔反思，才能将过去的不堪经历，变成未来进取的经验教训。否则，会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从普遍贫穷和“文革”运动中寻找对抗现实的思想资源。那只能导致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矛盾，以专制的结果终止冲突，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再度引向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未来。将我们的个人经历讲给公众，是靠近良知的大醒大悟，是面向未来的义无反顾。只有今天能得到反思忏悔的权利，我们明天才能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而那，才是改良社会不公、建设文明未来的文化和制度保证。

历史假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碍。忏悔，就是说出真相，请求宽恕。未来，必将用了解真相的方式清算历史，用公开真相的方式还原历史。清算不是复仇。只要有忏悔，便可得宽恕。因为，忏悔是拯救我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的人性。

人类的灾难多来自人类的傲慢。“文革”精神的本质便是如此，是想通过侮辱人性，成为他人的上帝。忏悔，便是放弃傲慢，向人性谦卑。

我们知道，罪过的反面不仅是德行，更是信心。看似无力却异常坚韧的文化和文化的最终

产品——精神与人格，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最重要资源。当“文革”忏悔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行为时，我们的民族精神才可能更理智，更宽容，更崇高，更自由。

如果能由“文革”青年一代引领“文革”忏悔，我们将不枉亲历历史灾难，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些许价值。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做起了这件事，我们就负起了历史责任；只要我们记下了历史，它就终将会被人阅读。

让我们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 原载《我们忏悔》，王克明、宋小明主编，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

【亡灵祭坛】

“反动权威”胡传奎之死

• 张阿妹 •

1966年的8月是疯狂的8月。在“砸烂旧世界”和“造反有理”的旗帜下，北京红卫兵涌向北京的四面八方，开始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轰轰烈烈的抄家破四旧运动。

那一年我14岁，是人大附中老初一的学生，也是人大附中红旗战斗队的一分子。我没有参加人大附中的老兵组织——红卫兵，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太凶了。

我亲眼所见，我的两名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在参加红卫兵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她们俩原来都很单纯、活泼、开朗，但忽然有一天，这些十四五岁小女孩的单纯活泼开朗都不见了。我看见的是，她们对着我们的班主任，凶狠地挥动着带铜头的皮带。

我们的班主任喜欢穿西装，梳背头，总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那时不过才二十几岁。那一天，我的这两位红卫兵朋友，一边用带铜头的皮带抽打老师，一边让其他的红卫兵按着老师，愣是用推子把老师的锃光瓦亮的大背头，剃成了阴阳头，前后不过用了几十秒。她们把这样的暴力称之为“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剥削阶级思想宣战”。

看到班主任在一群十几岁的自己的学生面前，低着头，弯着腰，脸上红一块紫一块，嘴里还不停地吐着诅咒自己的词儿，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我的目瞪口呆是不是革命立场不坚定的表现。但我记得我很快就坚定了下来，并且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精神力量：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但我决定不参加红卫兵，我参加了“红旗”。像红卫兵一样，“红旗”也是人大附中红五类的组织，但因对校长和老师态度比较温和，红卫兵叫它“保皇派”。

不管是革命派红卫兵还是保皇派“红旗”，他们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都绝不含糊。那年的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红卫兵小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和“红旗”都把这奉为绝对的圣旨。

8月的某一天，我和十几名“红旗”的兄弟姐妹，一起乘车到东单东总布胡同参加抄家“破四旧”。为什么去这条胡同，后来我才知道，在旧说“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北京，东总

布胡同及其附近，住着许多最该被“破四旧”的才子佳人、封建遗老遗少、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分子。

到了胡同口，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个坏分子名单。胡同居委会的一位中年大妈，还特意用手指着斜对面，告诉我们，那家住着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叫胡传奎。当时我们都惊叫了一声“胡传魁？”那时江青主持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主要人物胡传魁，早就深入全国人民之心了。

“对，他也叫胡传奎，但有一个字不一样。”然后，她很神秘地低声说，小心了，里边已经有好几拨红卫兵了。

有好几拨红卫兵了？我们带着好奇心和生怕被落下的急切，跨入了路北一座有两个雄伟的大狮子看门、挂着两个硕大的铜环的深宅大院。果不其然，里面已经有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标、扎着皮带，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学生红卫兵。

这个深宅大院真是深不可测，一个院子套着一个院子。我们目力所及，到处狼藉。衣服、瓷器、书籍及各种生活用品，散乱在各处。显然，我们来晚了。

“胡传奎在哪里？”记得我们“红旗”中一位年龄稍长一点儿的同学问道。

“在里院”，其他学校的红卫兵答。

我们赶忙奔往里院。在里院的院中央，站着一男一女，男的很胖，个头不高，秃顶，大约50来岁，胸前挂着一块牌子，记得好像是“反动学术权威胡传奎”。女的微胖，胸前也挂着一块牌子，写的好像是“反动婆子”。这就是这个大院的主人——胡传奎夫妇。

8月的北京，骄阳似火。胡传奎夫妇不知在似火的骄阳下，站了多久。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红卫兵向我们介绍说，每来一拨红卫兵，他们就要挨一次揍，每次挨揍时，红卫兵叫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们都会回答道“哎，哎”。

毫无例外，我们人大附中的保皇派组织“红旗”，也有人揍了他们，用的是他们腰里扎着的皮带。但我知道，我这次的革命立场跟上次看见班主任被揍已经截然不同了。

至于胡传奎夫妇怎样反动，并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也不知道叫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什么。我们只知道，这样的反动权威家里，可能收藏有金条，也可能有电台。当我们发现从胡夫妇嘴里掏不出金条和电台的下落，我们就分散在院子的各个角落，像其他红卫兵一样，挖墙凿洞，掘地三尺，试图找出隐藏金条和电台的蛛丝马迹。

我们找到的是整箱的饼干，成盒的蜡烛，成捆的书，还有成打的衣服，但没有金条，也没有电台。

我们累了，胡传奎夫妇也累了。我们喝水，到外边买东西吃。可是胡氏二人既没有水喝，也没有东西吃。他们仍然站在院子当中，仍然顶着骄阳，仍然挂着牌子，仍然挨着新来的一拨又一拨的红卫兵的鞭打，仍然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哎，哎”。

我不记得我当时有没有恻隐之心，我只记得，我看得麻木了，听得麻木了。可是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坚持下去。

入夜，我们像其他红卫兵一样，就地和衣而睡。那一夜，这个院子套院子的深宅大院，到底住有多少红卫兵？可能有十多拨，也可能有七八拨，每一拨至少有五六人。深更半夜，还不时地有新来的红卫兵闯入，新来的和原来的红卫兵又不时地发生争吵，而胡传奎夫妇的“哎，哎”声，仍然不绝于耳。

后来，“哎，哎”声好像越来越远，越来越弱，我似睡非睡。到了后半夜，一切都好像安静了下来。忽然，一阵尖厉刺耳的声音传入耳中，我猛地醒来。只见半边天烧得通红，浓烟掠过，夹杂着一股怪怪的味道。我和“红旗”的战友们，急忙跳起，循着尖厉的声音找去。

我们跨出那扇厚重的大门，发现整个东总布胡同已经塞满了救火车，救火员正向斜对面的一家院子喷水。二人高的火苗子就是从那里蹿出来的，火势越烧越旺，旺得根本无法进入。

当火势被控制以后，了解情况的红卫兵告诉我们，胡传奎夫妇半夜被另一拨新来的红卫兵带到斜对面那家院子，那也是胡氏夫妇的家产。他们在那儿被几拨新来的红卫兵轮番鞭打，可能是后来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就把家里的衣服和书籍堆在自己身上，点火烧了。

他们自焚？我不知道这位红卫兵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只是当火势熄灭以后，我和几个人趁着消防员没注意，一溜烟地窜进了那个宅院的大门。一进大门，我就看见正厅堆着山一样烧焦的垃圾，一些未烧尽的衣服和书籍的边角，隐约可见。其中有两块黑乎乎的东西。年龄稍大一点儿的同学指着那两堆烧得黑乎乎的东西说，那可能就是胡传奎夫妇。

怎么会呢？几个小时以前，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人，现在怎么变成两段只有半米长的焦黑木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死人。

后来经确认，胡传奎夫妇是被烧死了。而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死于没完没了的鞭打，也可能是死于最后还残存的一点儿做人的尊严。如今，在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上，竟然找不到一点儿他们曾经来过这个世界，又被迫离开这个世界的任何痕迹，呜呼！

今天谨作此文，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2011年6月10日

□ 摘自《我们忏悔》

~~~~~

## 【往事追忆】

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选载之三）

• 米鹤都编撰 •

◇ 今天看文革

针对文革，中央后来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听到文稿征求意见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原稿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王震同志的小儿子叫王之，他看了征求意见稿后，提了一个意见。他觉得这个说法不对，应该彻底地、坚决地、不保留任何保留地对文革加以否定。这个建议被小平同志接受了。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从文化革命的整体上，从发动到它的整个过程都是加以否

定的。

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对红卫兵运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要否定。文革的大背景是一条左的路线，毛主席发动它就是错误的。其中有没有积极的东西？动机好不好？我觉得历史重要的不是考虑动机，而是你真正做了什么，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现在回头看更清楚了，就是整个这十年是一个历史的反动。对于红卫兵，不管其中哪一派，什么中学的老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什么大学的一司、二司、三司；工人里面的各种工总司，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动能，把几亿人卷入进去，在里面经历血与火的历练或摧残折磨，是不可能被现代青年人和后来人理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那么一个现象，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真的不知道，更不会理解。如果从伤痕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很悲惨的历程。但是，通过文学作品解决不了对这个问题的理性认识，还是无法理解，所以要研究和了解那个大背景。

毛主席很厉害，讲话就像煽风点火，他把中央当对立面，向群众煽风点火。文革发展成上下结合、广泛的群众运动，高干子弟起了什么作用？他们也就是在初期，半年都不到的时间里，发挥了雷管的作用。他们所受的教育，家庭的影响，政治的敏感性，他们得到消息的灵便，这些人的革命激情，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让他们成了最适合的历史角色。

在这个大背景里面，西纠只是很短暂的一瞬。它曾经发出了一点声音，有一点回响，但它引人注目的程度却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存在。因为它发出的，是那个大背景下一点不和谐的声音，曾经是那个大潮流中的一点反抗。另外，它实际上是党内高层斗争的一个反映。因为实际上，红卫兵也好，北大的聂元梓的大字报也好，在那个背景下，不管是自发的还是授意的，事实上都成为中央党内斗争的工具了。西纠也是一样的。

在这期间，我们这些人有健康的東西，但很幼稚；有向上的东西，也很激进；有错误的东西，而且虔诚。我们曾经是红卫兵领袖，对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那就是要彻底否定所谓的红卫兵运动。作为一个当时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不应该以我们个人在当时是否有真诚、健康向上的心理，有想为国家为社会做事的出发点，就还要对红卫兵运动在评价上有所保留，对它有正面肯定。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应该持有的看法。

而且，我觉得对我们的错误更不应该仅仅从表面现象上来否定，虽然这也是必须的。表面的现象的否定就是诸如这些问题——你是不是不应该批评校党委呀？是不是对同学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有没有打过人啊？是不是到社会上参与了破四旧等一些过激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对文革应该有更深刻的反省，看到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以他个人的思想左右了党的路线，向着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方向发展。建国以后，他是一步一步的，从反右，到反右倾，到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这样发展过来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果已经被全国从上到下普遍抵制的时候，他依然坚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坚持他对党内所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压制，只要与他的这一套相悖，就都是反动的，都是阶级敌人。

对文革更深刻的反省，应当是像小平同志所说的，建立防止文革重演的制度。这是我们这些当年走过来的一代人所应具有共识，是对文革更深层次的反省。

在文革当中，既有一个主流，就是毛主席在推动的，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想法在展开。另外，也有不同人的不同角色，各人有各人的表现和表演。从个人的角度，我当时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呢？把这些记录下来对今后人们研究文革或许有些帮助。

首先从毛主席说起，我对他还是信仰的。毛主席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了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产生了批判苏联计划经济的一些想法，提出《论十大关系》。当中国有机会在正确的轨道上进步时，他转弯了。他认为，中国革命并没有因为取得政权而结束，从国际上对苏联的论战，到国内他认为也存在着两个司令部，还批评了什么八级工资制等，后来就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套理论。但我们依然相信他的洞察力，认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提出中国革命怎么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从思想上还是努力想跟上他，这在当时很明确，没有动摇怀疑。

平心而论，我对文化革命的目的所指知觉得比较早。我觉得文化革命绝不是冲着学校党委、党支部书记这个层面的人来的。绝对不是！主席的讲话已经一次次地指向党内高层，认为存在一个势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存在着一个对象，后来总结出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9月13号的《红旗》杂志提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7）；还有少奇同志的排名，从第二成为第七；中央常委从7常委变成11常委，这些现象都不同寻常。看到这些，还会认为这仅仅和学校的党委、党支部书记有关吗？这还是仅仅一场文化教育领域内的路线斗争吗？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吗？

这些大概是西纠这件事的基本背景。为什么叫我们“保爹保妈派”呢？人家说，革命革到他们父母的头上，他们就转变了革命的立场，开始跟群众运动对立了。这个运动是冲着谁来了？原来是冲着党内少数有问题的干部，后来我们很快就感觉不对了，文革是冲着党的骨干——整个干部队伍来的。

文化革命中，可以说毛主席采取的那些做法是必然的。他是非要搞不可，而且他非要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是不是必须要用这种方式解决党内矛盾呀？他完全可以在党内开会来解决呀，开中央全会嘛，说明自己的观点嘛，不行！他非要把这场运动搞成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嘛，那就一定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你死我活的大革命。只是后来出现了大量群众之间的斗争，甚至大规模武斗。社会真乱了、失控了，我看这是毛主席始料未及的。这时，他才往回收，用军管才控制了局面。这时，我们还是对毛主席存有信仰之心。

后来我们下乡，到农村去。实际上毛主席在农村问题上，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把人民公社体制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直都在调整，这种调整一点点接近农村实际。在农村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但还只是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研究、去探讨。没有涉及到整个农村体制，也没有直接怀疑到毛泽东的权威性和正确性，可以说远没有到怀疑的地步。

特别是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但是我们事实上是把江青、中央文革与毛主席分开来看待的，认为他们不是一回事儿。在当年，不仅我个人有这种想法，我看这也是很多老干部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撑着文革中老干部们的精神。大家认为，江青是江青，主席是主席。我们有危难，我们要找主席，而不是找江青。有几个人说，江青，你救救我们！没有！所以说，在文革中期之前，要说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是没错的，但是从内心对毛主席的信仰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动摇。

江青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我们这拨人的心目中，江青始终得不到一种真正的尊重。她的做派，她的随心所欲、情绪化，让我在心里始终对她有一个直接的反感和对抗。1966年12月16号她在工人体育场点了我父母的名，直接导致我们“家破人亡”。事实就是，她一个人的一句话，当时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把我们这个完整的家摧毁了。我母亲是不是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我父亲是不是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呢？我从内心深处是不能接受的，所以

内心就很矛盾了。毛主席高高在上，大家把他当成神一样，那江青的所作所为是毛的意思吗？符合毛的政策吗？至少在表面上，毛主席对干部政策，什么给出路啊……讲过好多话。对我们这种走资派的后代也有说法——可教育好的子女，可教育的后代等等。但是，到了江青那儿，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家庭也是这样。我至今还是觉得，江青这个人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

还有对中央文革这些人，我们心里肯定是对抗的，在西纠时其实就是对抗的，联动则是直接公开地挑着旗对抗。联动这段，我在监狱里没赶上。要是赶上了，我会不会参加也不知道，有可能人家会拉我参加，就凭你在学生里面的影响，你就得上呗。

林彪呢，他从开始就是一个比较直截了当的形象，是毛主席的副统帅，但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我们一种怀疑。为什么王军能对我说：你们反林彪，我就给你们钱办报。为什么能这么直接谈论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对林彪是有看法的，以前交流过。这事儿当时的确够悬的，1967年在四中我二进宫的时候，最担心的一个是江青的事儿，一个就是林彪的事儿。其实，对林彪，当时我们脑子里就是有所怀疑，不是那么信服吧，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点儿。而对江青那就是直接对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总理呢，简直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遇到了那么大的危机，遇到了那么大的问题，我就觉得，总理在我心中，在我们一大批人的心目中，就是期待。而且我们相信，跟总理的沟通，如果能得到他的关心，那直接也就能够得到毛主席的关心。我一直是这样一个想法。不说别的，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时说的那段话：毛主席讲了，你们呢，不要再关在里面了，有错误呢，也还是要出来，继续去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而且，总理他还是敢承担责任的，他肩膀还是硬的，他那两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董良翮、孔丹，你们有错误，我也有责任。什么意思呢，就是教育你们不够嘛。总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很受感动。

后来，有些老同志对总理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在我看来，总理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还是那句话，没有周总理，可能老同志们的基本状况就会更加艰难，文革的进程就可能拖不到十年，也许三年五年就崩溃了，也许血雨腥风更早来临。我想，应该公正地对待总理，因为总理在保护老同志的方面，这个功劳是历史的作用。他采用了很多迂回的方式，比如对我父亲他们这一群人用的是“监护”，把他们关进了卫戍区了。如果当时不这样做，而是放在外边，保不齐被哪个造反派拳脚相加，被打死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康生是一个能量非常大的人。他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有没有过贡献？比如说情报工作上的贡献？我想也是有的。但他的手段也很厉害，在确立毛主席在七大上的权威地位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对他来说，整风就是整人，这大家都知道，他永远都是毛主席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的杀手锏。

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既有相对稳定的力量，也有后来在中间变化的。谢富治的立场和表现就很典型，他属于后来被四人帮拉过去的。

对于刘邓，文革中他们被定性为与毛主席对立的司令部。我对少奇同志很崇敬，小时候也见过他。当时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经常学习的经典。我入党时的观念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然后自己还加了一个“奋发有为”的修饰词，就是还得有点能动性。《论共产党的修养》对我思想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包括传承孔孟之道啊，修齐治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面的思想，包括慎独等。

我在监狱里面被学校提出来开批判大会那一次，全场喊口号，“打倒刘少奇”！这对我来

讲很突然，我没有举手跟着喊。事后他们质问我：好你个孔丹，怎么喊口号你不举手？我说：唉，这得按中央要求啊，得有文件才行。中央没有明确说刘少奇要打倒啊，他还是常委嘛。中央还没有文件，这口号能随便喊吗？我的脑子就是这么想事儿的。当时我还把脖子一挺，说：你斗我，我也不能举手。我就认这个死理儿。我后来想，这是不是因为我对少奇同志有这个感情？

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紧的是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这样提起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应道：“我们老爷子就是这样说的。”我很欣慰邓小平这样伟大领袖的心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至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中国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百分之九十五、白区近乎百分之百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确立。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冲击和反思，就不可能有比较坚定地回到曾经被极大偏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并推动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让我们抛弃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的各种主义和主张。历史就是这样把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转化成了伟大的民族复兴。

注释：

〔17〕“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最早源于1965年1月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后见于《五一六通知》，普遍引起人们重视是在1966年9月13号的《红旗》杂志之后。编撰者注。

~~~~~

【研究评论】

“文革学”的三大泡沫

• 韩少功 •

“文革”是一个事实和情绪的巨大总量，交织了数亿人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后的有关争议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缓，而是更烈；不是更精确化，而是更口水化……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难度。因供职《天涯》杂志的关系，我曾结识不少活跃的学者和作家，发现“文革”几成他们的心结，是他们不愿谈、谈不清、一谈就七零八落的话题。北大教授戴锦华曾私下里感叹：她与外国同行说中国，什么事都好说，只有两块最棘手，“文革”即其中之一。在另一方面，右翼看似统一，却也是裂痕暗布，比如应否承认“文革”中的“人民文革”，这一问题上的点头派（杨小凯、郑义、朱学勤等），一直遭到摇头派（徐友渔、徐贲等）的鸣鼓而攻。

漫长的历史长卷里，空缺和悬案其实比比皆是，并不是所有事都能真相大白。其中很大一部分，不过是时过境迁后淡忘了，模糊了，消散了，被其它话题淹没了，甚至是当事人一代统统死光后就无需再说——那不是解决问题，只是靠时间来取消问题，靠人口减员给大脑减负。

这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积极的遗忘”（引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商务印书馆，1998年）一说应有之义？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有多少秘密深埋在广

袤大地之下，无法知道历史长卷是否更像一张破网。项羽是否真烧了一个阿房宫，欧洲“圣殿骑士团”是否真留下了宝藏，伊利亚特战争是否起因于争夺一位美女……这些事也够大的，牵涉到苦难和血泪。但如果不是吃饱了撑的，眼下大概不会有人大举较真，投入巨资和团队，一定要挖个水落石出。

还有很多问题，虽未被时间取消，却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因“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落到现实的语境时便受制于言说者们的生存处境、利益背景、阅历准备、知识成见、时代风尚、媒体影响乃至个人情绪，被各种现实因素所选择，所牵引，所挤压，一步步变形，最终被搅成一团乱麻，造成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分裂。“文革”好像就是这样。我的一位老邻居，白天想起当年禁麻将就骂“文革”；晚上想起当年同厂长工资差不多又赞“文革”。同是这一位爷，在歌厅里不熟周杰伦、刘德华只好大唱红歌，进茶馆同某个哥们儿抬杠，情不自禁模仿某位文化偶像，又可能大骂自己刚唱的“烂歌”——你没法同他较真。不难看出，一位退休师傅身上也伏有多部“当代史”和多个“小姑娘”，自己同自己过不去。

换句话说，先哲们假定的那种认识风范，不被任何私利和情绪玷污的学习态度：每个人都温良，都审慎，都稳定，背着小手和眨着大眼，公正得像一个萌态可掬的上帝，理智得像一块无欲无念的芯片，于是说话必有据，说话必从理，说话必见贤思齐，于是事情越辩越明，大家最终不难在辉煌的真理圣殿欢聚一堂……这种理想一再出现于传说，一再成为知识供应者的承诺，在实际生活中却总是七折八扣——特别是在一个话题被利益和情绪劫持太久以后。

当政高层在三十多年前划定“文革”讨论禁区，也许出于止乱避险的权宜。面对数亿人的派别裂痕，事由各异的普遍伤痛，如果不想在伤口撒盐，不想给余火浇油，不想把某些群体或所有群体再伤一次，那么暂时冷藏“文革”话题，粗线条划定舆论口径，动员民众“一切向前看”，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敲槌禁声。谁都有两难的时候。谁都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经验。为避免社会分裂和谋求政治减压，美国人也曾以法案形式搁置过“抽屉问题”（如1983年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叫做gag rule，俗称“闭嘴法案”。该法案规定对任何要求废奴的提案都一律搁置，国会不予讨论。主张废奴的林肯当时也投了支持票）待条件成熟后再摆上桌面。欧洲人在种族、排犹主义等敏感话题上也一直绷紧神经，封杀异议，绝无自由。在那里，谁愿意丢饭碗，敢像日本右翼挑剔南京大屠杀数据一样，去挑剔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有关故事？谁愿意吃官司，敢像某些国人为汪精卫翻案一样（为汪精卫投日的翻案文章不少，如2012年12月24日共识网上《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文，网址为<http://t.cn/zjWq4zf>），去为德国纳粹和法国贝当政府抱屈？

从长远看，暂时冷藏问题，把争议扫到地毯下去，也会留下隐患。“文革”是整整一两代人的的人生经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留下了哪些教训，并未得到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更未积累成公众的思想财富。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后半场，“文革”的空白化、标签化、混乱化，相当于一种自我理解的残障，也必然对整个国情的理解造成迷茫，扰乱人们前行的视线。“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却出现在西方。”这一说法怎么说也不能让中国人很有面子。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学”课程，前去选修的学生达千人之众，人气飚升，热浪叠起，以至这门课后来一直很叫座。较之于国内媒体对“文革”的闪烁其词，较之于“文革”资料在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量锁入秘库，有关“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石沉大海，西方那些国家里有关著作车载斗量，有关专家明星辈出，迅速形成了一种知识强势。在很多人看来，这也陷国人于道德窘境，与日本右翼势力对待二战的态度相去不远。《上海生死劫》、《鸿》、《革命之子》等纪实作品，出自“文革”后最初进入西方的一些国人，当然多是磨难较多的知识精英——纷纷名列畅销书排行榜，被不少大学指定为必读书目，无疑是个强势的起点。其中《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我的大学同学，与我一道步行纽约时，常被陌生的美国读者招呼，攀谈，诚邀合影。用他的话来说，鲁迅在美国的名气，不及他万分之一。

据我后来在美国所知，这种说法并不是他吹牛。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革学”相当于中国原料加西方技术，相当于国人的某种记忆外包和知识信托，把脑袋搁在人家的肩上。一个巨大的知识产业，经“出口转内销”和“内销转出口”各种渠道，历三十多年发育成长，在中、西之间一再获得循环增值和双向扩张，最终以散件进口境内整装的方式，悄悄渗入国内的讲坛、沙龙、网络、出版业以及街头私议。很多国人的思想胃口和意见市场，被这一产业完全接管。常见的情况是，有些西方人士认定“他们中国人自己都这样说，那还有假？”而那些中国人恰恰是在隔洋学舌：“旁观者清么，他们西方人都这样看，那还有错？”——这些真相寻求者一再狂追自己的背影，把自己的背影当成了神秘的蒙面证人。

不管怎么说，这是国内知识界的一笔巨额欠账。

一个制造品的出口大国，却长期依赖知识与思想的进口，终究不太正常。作为富有红色经验的大国，又是学术、文学、教育、出版的投入大国，俄国和中国远比众多欧亚小国更有思考责任，如不偿还这一笔欠账，实是天理不容。

◇ 宫廷化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前面提到的马若德，另有译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西方“文革学”的重要创始人，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细心梳理了“文革”的过程和原因，最终确认“这场运动多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他在书中另一处总结，是“毛泽东对革命纯洁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权威”和“民粹主义观念”，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过程。（见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中国官方的定调大体接近，正如“彻底否定”“文革”的官方结论与西方主流说法大体重合。具有官修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出版，也认为在“文革”发生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近些年来，国内少数几本获准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和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均持类似观点。这些书中提到悲剧发生的原因，如“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所受到的惩罚”，当然也是意指毛泽东。

这样看来：一是个人问题。二是认识问题。

这里隐含的逻辑是：一，如果毛泽东的位置上换了别人（不妨设想疾病、车祸、政变等事导致换人），“文革”就可能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在没有毛泽东的地方，“文革”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没什么机会。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他认识错误，如果他脑子好用一点，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一点，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能读懂德文原著，或智商再提高20或30，事情就不会那样。如果他脑子里多一点自由主义（右翼所愿），多一点孔孟儒学（新儒家所愿），甚至多一点解构主义、犹太教、绿色思潮、计算机原理、重金属摇滚乐……事情大概也都不会那样。在不少人眼里，那种情况下的中国或可跳过十年或三十年，从1949直接切换

到1978，甚至直通1980年代的欧美，脱下草鞋，开上法拉利；丢下窝头，换上人头马；私塾弟子们立即读上了《华尔街日报》。

这种历史偶然论是否太过虚玄？是不是一种变体的个人崇拜？一具肉身若神通广大到能让偌大中国下地狱或上天堂，随心所欲给历史添上几十年或删除几十年，不被崇拜一下又怎么说得过去？

说实话，我也好奇红墙内幕，相信领袖的巨大作用。但我怀疑几十年的历史只是数亿人运气太背，碰到了一支下下签，是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心梗致死。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很想看看作者们还说些什么。可惜的是，追责到此为止，谜底似已揭开，他们大概觉得自己已能交代得过去。

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绝对威权，考虑到他在集权体制下的咳嗽一声举国静默，他当然对事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这样说并不为错。把很多错误记在他名下，这样说有时也大体不差，特别是对于小学生来说也许够了。问题是，这里的错误是指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长官经济、政治高压、文化禁锢、人权灾难等，即中国语境里的“极左”。这种极左并非中国特产。在前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越南、柬埔寨……那些没有毛泽东的地方，包括在那些官方舆论起劲儿反毛、反华的地方，火烧毛泽东画像和把核弹头瞄准中国的地方，上述错误也大同小异层出不穷，诸多故事让中国人十分眼熟——这正是我当年决定翻译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因，大概也是这本书热销的主因。

那么，上帝是否克隆了一大批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一个不落地分派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让他们的个人问题和认识问题一齐发作，让诸多下下签一齐生效，从而造成了国际红色阵营普遍的失误和重挫？一个短路点就在这里：如果承认那些地方也有极左，那么极左就与毛泽东不存在唯一的因果关联；如果认定极左只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独一份的发明，那么上述国家的类似情况就来历不明，殊可奇怪，与“文革”扯不上近似值与亲缘性。国人们的眼熟纯属有目无珠。

我们该往哪边说？

这种毛泽东的“群发现象”不仅出现在境外，也出现在境内。作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之妻，王光美亲历过不少高层内情。她饱经磨难，但家中一直悬挂着毛泽东与她全家人相聚的巨幅照片。听说毛泽东的女儿病了，她联系医院寻访名医，去对方家里帮助打理家务，事后还把毛、刘两家的孩子们悉数召来，一起欢度大年除夕——这样的合家欢后来一再重现。她的道理是，账不该算在某个人的头上。用她的话来说：“‘文革’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见孙兴盛文《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载2009年12月4日《今晚报》）

“那些人”当然是指一大批，遍布各地、各业、各级的大小推手，包括各个推手下面同样“管不住”的若干人。撇开其中的恶棍，就连很多不幸的蒙难者，真诚的革命者，运动的诸多攻击对象，如王光美的丈夫刘少奇，其实也不时闪烁毛泽东的影子，有点“小号毛泽东”或“疑似毛泽东”的味道，分享了某种共同气质。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人也曾极左，至少是不乏偏左、易左、防左无力的思想特点。陈云在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讨论时强调：“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

史出版社，2011年）邓小平对外宾坦言：“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文献与研究》2011年第21期）这是一种谦逊之词？还是一种宽容之态？如果看一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便可知他们后来的反省事出有因。如果再看一看刘少奇主持的1947年解放区土改、1964年前后的农村社教……后人还不难发现，当某些极左倾向冒头，倒是毛泽东表现出质疑、审慎、诘难、劝阻、反对，甚至彻夜难眠。这样的事例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比如在推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从1956年写《论十大关系》，到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同年的武昌会议，到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到1960年中央《紧急指示信》，到同年12月北京会议，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他多次强调反左，压指标，肯定商品经济，肯定价值规律，反对“共产风”等，其低调态度屡屡遭遇很多下属的抵触。）很多时候他对同事们“打击面过宽”的严词纠正，同样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打击面过宽”是一种含蓄的公文语言，对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意味着恐吓、羞辱、拘禁、抄家、失业、离婚、私刑、死亡——1947年后有些地方极左的“流血土改”便是例证之一，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也是。据马若德周详考证，相对于彭真、陆定一、刘少奇等反右“强硬派”，毛泽东倒是一直“温和”。但他对鸣放的鼓励，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固守，还有“恳求宽大”和“阻挡对右派的全面政治迫害”都无济于事，最终只能迁就强硬派的愤怒，与各方磨合与“妥协”（引自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了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他必须认账，必须加以圆说。马若德这一描述还有待更多解密档案加以检验，但哪怕只有部分真实，也足以让很多人惊讶。显然，这一些运动已是“文革”的相似形，“文革”的初级版。“文革”并非1966年突然砸在天安门的一个天上怪物，更像是从历史深处慢慢长出来的政治肿瘤，不过是毛泽东所怀疑和反对的错误，与他所赞成和推动的错误，相克相生，纠缠错杂，交叉感染，反复震荡，最终滑向了天下大乱。这一段乱纷纷的往事怎能不让王光美这样的过来人千回百结！

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

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很久以来，我们多是从众多史学著作和传记影片中熟悉这些人物的。我们看他们如何口授机宜，沉思踱步，激情演说，计上心头，妙语博笑，指挥千军万马，接受万众欢呼，让秘书、警卫员、参谋长、同盟者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或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很容易相信他们无所不能，一个指头就能拨动历史。他们的一台电话机和一枝铅笔几乎就是历史的全部秘密。出于趣味的考虑，出于体例的传统，或出于政治外行的想象，一些文艺范儿的制作者，很少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的身不由己，看到他们的无奈，看到他们妥协的加减乘除，看到他们想做的事做不成，不想做的事却偏偏成了，想做成甲的事不知为何竟做成了乙……“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代罗隐诗句）这种深刻的感悟不大进入这些作品，成为具体描写和生动形象。

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部领袖史。

这种文本诚然记录了部分真实，如同大脑指挥四肢的真实，却不明白躯体也反过来制约和决定大脑——大象的身上是不可能长出一个猴子脑袋的。退一步说，即使大象身上成功嫁接了另一个脑袋，也不大可能使象腿变成鸟翼，变成鱼翅或鸡爪。相反，只要大象的庞大身躯和五脏六腑依旧，大象所依存的气候、地理、物产、天敌等生存环境因素依旧，一个哪怕成功移植

的猴子脑袋，还是很可能长出长鼻子和大耳朵。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推想：为什么唐太宗再开明也不可能签署中国的《自由宪章》，为什么拿破仑再强霸也不可能成为法兰西的苏丹，为什么老子再睿智也不可能在竹简上创立后现代主义……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不是可以随意装来装去的脑袋。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灭英雄，也流产或夭折英雄。他们的大有为，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历史大势与合力的产物，不再是某种平衡点和聚合点。历史上的思想家（如老子）、科学家（如爱迪生）、艺术家（如提香和塞尚）、体育明星（如博尔特和姚明）都不过是身后同类群体、同类次群体、同类次次群体中的最终出线者，合适的形象总代理。

领袖史（俗称为帝王将相史）夸大个人作用，充满太多花哨的宫廷故事和偶然情节，却容易让人们舍大求小，放过对制度与文化的检讨。

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自得的批判？

◇ 道德化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

与马若德和费正清的看法不同，生于比利时的勒斯（Simon Leys）在《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llison Busby, 1981）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革”除了名称，与“革命”和“文化”统统无关，纯粹是欺世盗名，不过是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为了夺回权力，不惜发动运动，于是把中国推入万丈深渊。

这位译过《论语》的汉学家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听多了一些宫廷故事，满脑子都是大人物晃来晃去，都是他们威风凛凛的排场，一旦发现他们的说词大而不当，高调不实，离奇古怪，有东没西，几无学理逻辑和务实关切，人们的“权力斗争”印象便肯定更为深刻。

在一个大争之世，一口咬定所有人都在干坏事，对于干过坏事或想干点坏事的人来说，当然也是方便的自我心理宽慰。

政治人物并非圣人，因利益、面子、意气、人脉关系等发生相互磨擦，继而发生挤压或碰撞，都实为寻常，与市井纠纷和家长里短没有太大不同。政治高压下的个人安危，滋生各种抱团和依附的生存策略，滋生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也确实构成了“文革”面貌的一部分——在运动后期尤其如此。不过，说毛泽东曾“大权旁落”，活在中国的人恐怕打死也不会相信，特别是在“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等已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更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把一部十年或三十年的大国史仅仅归因为权争，归因为个人的心理阴暗和欲望变态，归因为领袖的道德败坏，不仅过于通俗化，接近茶馆龙门阵的口吻，而且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时代的宣传。在那种宣传里，在有关小说、电影、展览馆里，坏事都是坏人做的，坏人都必做坏事。蒋介石生有梅毒，宋美龄奢侈得天天用牛奶洗澡，刘少奇早就叛变投敌，布哈林是个阴险的谋杀犯，美国兵只会泡妞喝酒并且撅起屁股战场逃命，地主都獐头鼠目或青面獠牙，国民党女性差不多都是妖艳风骚的烂货……这种把对手妖魔化的习惯，哪怕经过后来数十年的文化淘洗，直到今天仍余迹尚存，足见顽疾难治（如王朝柱编剧的某些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造神旧习仍多。出版于2009年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虽在内容和文风上有很多改进，对蒋介石等人的妖魔化仍有残痕）。

一些左翼人士怀念红色文化，但他们不明白，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一报还一报，徒弟打师傅，红色文化中多见的妖魔化这一飞去来器难免伤己。想必是打小就熟悉政治宣传，出身于红色官员家庭的张戎继一本《鸿》在西方引起轰动，再度与其英国丈夫哈利代（Jon Halliday）联手，推出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Jonathan Cape, 2005），把颠倒版的妖魔化又一次顺溜溜地回报给故国。在这本书里，毛泽东一伙被写得一生坏透了顶，集杀人狂、二流子、阴谋家、贪污犯、神经病之大成，似乎新中国不过是这一类魔头的偶然得手，靠一路造假最终登上了不那么“假”的天安门，靠一路使坏最终把中国折腾成“坏”到了家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至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后来在《纽约书评》的长篇书评中，也认为该书最大的败笔是材料可疑。热烈吹捧该书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也不得不留下一笔：他担心有些材料可能出自伪造（转引自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第48期）。

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擅长此道的京夫子，著有《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南海恩仇录》《北京宰相》（台湾联经出版社于1990年代陆续出版）等畅销书，原笔名古华，曾以长篇小说《芙蓉镇》获大奖，其才情一度广获赞誉。他来自湖南郴州乡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古怪方言让我难懂，在省城里看个电影或买双鞋也得求人带路。但这一份土特产到加拿大后变身为秘史专家，一举揭发出红墙里的秦始皇和西门庆，还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心里明白”一类话，把描写对象的脑神经信号悉数挖出公之于众，实让人惊奇。有一次，我随着他的描写进入中南海，过新华门后便成了瞎子——门内的路径、楼台、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当事人都是直接从大门外一步跳进密室，在无形无貌的真空里生活，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真进过这张门，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标。吕正操老人曾对我说：“我当铁道部长那时，脱离身边人员的视线二十分钟，也得报告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国家首脑怎么可能独自走出中南海西便门，撑一把雨伞，戴一个口罩，坐上公共汽车，跑到居民区去会情人？”（吕正操指艾蓓《叫父亲太沉重》中的情节，该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1984年出版，为诸多“揭秘”红墙道德内幕的流行作品之一。）

从一个土夫子变成京夫子不难，当上历史神探却非易事。我在乡下遇到的一位喜欢抬杠的人，对毛岸英“镀金”一说也大不理解。说到毛泽东当年送儿赴朝参战，这位农民说：“他还要镀金？他还用得着镀金？不是说他老爹当朝圣上么？一个东宫太子，就算睡上几十年，要上几十年，谁敢不让他接大位？为何偏要送他去打仗？”

老汉所知不多，比方不知去北京该翻几座山，更不知当时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尽在美军一方……但这类土夫子的日常逻辑正支撑另一些想象。

我不是什么知情者，也不愿意参与这些想象。我只是看不出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的无聊打杀有何乐趣，看不出圈占公帑或猎取版税的商业策略有何不同。我只是怀疑那种纠缠于离婚、薪水、疾病、稿费、房产、后人吃啥喝啥（关于毛泽东后人的情况有各种传说，其中有知情者称他们并未大富，甚至十分清贫，如简妮《近期李讷三访》文，载《海南纪实》杂志1989年第8期）的喋喋不休，怀疑那种长舌妇和民间神探，对于历史反思有多大意义。

当然，道德这事很重要。道德是历史过程中时隐时现的强大引力，但具体到个人评价，道德与政治似乎并不能重合为一把尺子，倒像是纵横两个坐标。换句话说，道德尺子能量出这一派的A型和B型不一样，那一派的B型和C型大不同，但如果要把善恶分别挂钩某种政治站位，

实行对口管理，特别是在公众利益出路不大明朗时，则可能有点冒险。硬要划出这种链接线，则一定自添其乱。马丁·路德·金算不上操守严谨。作为一个牧师，他通奸和嫖妓。作为一位博士，他抄袭和剽窃。这些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他领导的民权运动仍无可否认。军阀吴佩孚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连他的敌手如董必武等也承认他治军有方，律身有则，统兵数十万却一生“没有私蓄，不置田产，有清廉名”（见董必武文《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载1939年2月《群众》周刊）。但这位大善人对抗北伐和反对共和，仍是负面政客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黯淡。

造神者与擒妖者如何对付这一份人的复杂？目光再放远一点，伏尔泰、卢梭、华盛顿等同样在个人品行方面留下了巨大争议，留下一大堆关于情妇和私生子的闲话（传伏尔泰被富婆包养，卢梭有不少私生子，华盛顿蓄有不少奴隶，都属于私德有亏），他们在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卓越建树却很少被后人怀疑。有关研究者似不会拿几个道德标签贴来贴去，把历史变成一种善恶排行榜，一种好人好事大评比，一种道德偶像的十进五或五进一。

说到这个份上，即使一个毛泽东所受到的品行指责全部算数，全部入账，对“文革”的反思是否就算大功告成？

诉苦化

我离开乡村时，“文革”十年还未结束，乡下已开始试行推广袁隆平主持培育的杂交水稻，各村都派人去炎热的海南岛制种。“公本”和“母本”一类成为农民们的新词汇。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没有农民俗称的这种“霸王稻”，没有杂交水稻所代表的一系列良种推广，没有由此而来的粮食产量倍增，不仅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产品剩余和农业人口转移都无从谈起。哪怕中国再开几次“三中全会”，后来全国取消粮票，珠三角和长三角聚集亿万农民工，西方制造业向中国大举转移……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是困难重重的。

心存这一印象，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特别对我的胃口。这位法国学者最关注历史结构的底部，与很多同行不一样，总是把放大镜对准民众史、基层史、生活史，比如从人口、疾病、地理、物种、饮食、住宅、技术讲起，从基因和细胞的层面解读资本主义的生命。他终于使史学不再是头重脚轻的无根之木。

与他相比，另一些同样是目光下移的史学作品，如美国人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多一些记者风范，深度也许不及布罗代尔，却也有足够的叙事广度。这本书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形态、时尚风貌、人物趣事、报刊习语、事件细节等，是一种多机位和宽覆盖的镜头监控，给历史全景扫描。如果请这位先生看“文革”，他也许会骑一辆自行车满世界遛达，留意“忠字舞”的娱乐功能，留意“大串联”的旅游意味，留意造反派的裤裆和粗痞话——不少暴力大概都涉嫌荷尔蒙压抑后的变态释放。较之于某些领袖史，这些细节或能使历史面貌更完整，也更容易理解。在这种理解之下，运动中的人更像人，不是疯子，不是符号。

“文革”讨论禁区后来有所松动。虽主流媒体大体沉默，但在学术研究和文艺表达方面留有一点余地，“擦边球”和“游击战”也不少。被视为“妖魔化”中国最力的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记者，挟美国图书大奖之誉，也有涉华代表作在中国出版（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by Fox Butterfield，台湾版译名《中国：苦海余生》。大陆版译名《苦海沉浮》，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行政防堵力不从心。不仅《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牛鬼蛇神录》（杨小凯著）等境外出版物在网上畅流，一些民间电子期刊如《昨天》（何蜀主编）、《记忆》（启之主编）等也十分活跃，迄

今为止已分别出版了数十期。这一类文本重在亲历性经验，多角度、高密度、大规模、持之以恒地还原“文革”景象，顽强唤回国人的记忆与追问。

如要挑剔不足，就是其中一部分叙事详而解析少，流于平面堆砌，仍习惯于亮伤口和晒血泪，原料供货方的模样，处于“文革学”的产业低端。其中一些或可称之为“诉苦化”，有数量的增加，少见品质的提升。

诉苦是受苦人的正当权利。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按中国官方最初的统计，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材料，“文革”中共有729511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引自《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1年）——如此普遍和深重的冤情就不该诉一诉？万千冤魂就只能在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下一笔闪过？

与中国官方数据不一，马若德和费正清估计“文革”十年中受害致死人数应在40万到50万之间（引自马若德和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这里搁置其数据来源，暂且取其上限，摊到每一年即5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从万分之0.04升至0.59（中国1966年人口总数6.4亿，1976年人口总数9.3亿，十年间平均数为8.35亿。这里的死亡率权且以马若德和费正清的估计数为比照基数），上升了十几倍。

50万——无人能在这个数字前无动于衷。如果这一估计准确，这样的白骨累累尸横遍野，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内战，显然更值得人们勒石铸鼎以昭后世。然而，摆上思想与学术层面，巨大悲情对于“知其然”也许够了，对于“知其所以然”仍然不够。重要的理由是：并非只是“文革”才出现非正常死亡，若止步于此，“文革”的反思价值反而会被削弱。

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一下：

美国因枪支管控不力，每年致亡人数逾3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万分之1，已接近两个“文革”。

陷入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中的希腊自杀率急升，仅2011年就近千人，其中多是失业者和破产者，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0.9，也远超“文革”。

载于《柳叶刀》杂志的一份《2010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称：光是空气污染一项，2010年就造成全球320万人死亡，其中120万中国人过早死亡，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9，竟是“文革”的数十倍（引自2012年12月英国《柳叶刀》杂志）。

回到政治领域：与中国“文革”在时间上相当接近，1965年印尼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得到了美、英、澳等西方政府的支持，至1966年已杀死超过100万的左翼人士和穆斯林（另有统计数为200万，甚至400万），其中光是美国大使提供的捕杀名单就多达数千人（见麦克·海德（Mike Head）发表于澳大利亚《悉尼晨报》1999年7月间的连续报道）。比照印尼当时1亿左右的人口总数，该国的迫害致死率约万分之50，又是近90个“文革”——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一直被西方主流媒体消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更不会在哈佛设立学科，直到多年后才偶然浮出水面。

还有吸毒，犯罪，饥荒，矿难，有毒食品，交通事故……同样是一篇篇血泪故事，导致千万鲜活的生命过早熄灭，意味着太多窗口里的捶胸顿足和深夜长泣。如果“文革”需要诉苦，

需要指控，需要对体制与文化的批判，那么这些更惊人的死亡数据该如何处理？是不是也要推出几个或数十个学科？

毫无疑问，凡悲剧都值得痛惜和深思。消除这些悲剧更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动，需要达成某种社会共识，始于泪水却不能止于泪水。那些有权控诉的人或可注意，他们毕竟是相对少数，与相对多数之间存在经验的温差——这是取得共识的通常难点之一。比如大多数中国工人在“文革”中就受害较少。他们享受“领导阶级”的地位优越，领取令人羡慕的月薪，甚至轻松和惬意于党政机构的一时瘫痪。其中的年轻人若稍有才艺，便可能出入苏式的工人文化宫，在舞台或球场那里留下浪漫的青春回忆——我就见识过不少这样的红色小资和劳动贵族，衣着讲究（如热衷于回力牌球鞋），趣味不俗（唱一唱美声或夹一个画夹子），吹着小口哨，简直把“文革”混成了带薪长假。农民呢，比起工人来说要穷得多，累得多，但只要没遇上灾年，比起当年躲日本鬼子或办公社食堂，他们大多觉得“文革”的日子还算过得去（“文革”十年中的农业生产受运动冲击较少，全国收成不算太坏，据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那些年的农业用电量和化肥消费量分别增加十多倍，1978年的粮食产量30475万吨，是1965年的1.6倍），对教育普及和合作医疗还心存感激。马若德和费正清称“农业在全国范围内比工业所受影响要小”，就是指这一段（引自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工人和农民也会觉得“文革”有太多事可笑和可恨，但他们一般没有挨批斗的经历，没有下放和挨打的皮肉之苦，一直活在政治安全区。在这种情况下，当受害者谈起“文革”，若发现对方眼中闪过某种迁就、茫然、疲惫、麻木甚至不无可疑的怀旧，难道有什么奇怪？一旦在市场社会滑入困境，这些家伙就举起毛泽东画像走上街头，生生地不按“正确套路”出牌，难道不也是情有可原？

“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的，分别是知识分子、旧时的地主和资本家、官员（所谓“走资派”）、中途翻船的造反派（如5·16分子（北京一些造反派组织于1967年联合组成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公开指控周恩来，以“反党乱军”言论著称，后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1970至1974年中央部署各地打击这一组织，致造反派普遍受到清算和惩罚）……其成分五花八门，麻将桌上的十三不搭。他们的悲情并不一样，版本之间出入很大，合唱却并不同调，构成了一种心思各异的齐心合力。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刻骨痛感无法通过针头注射给一位老钳工，无法通过芯片移植给一位菜农户，从而使天下人都心往一处想。他们的故事通常能广获外人同情，一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见鲁迅短篇小说《祝福》，载小说集《呐喊》，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丧子之痛最初无人不怜，催动了大家的泪水。不过，依据现代人的平等原则，尊重回报尊重，他们不能奢望一键之下，自己的记忆就可全面覆盖他人的记忆。依据现代人的民主原则，他们尽管构成了一个惊人的人口大数，哪怕如胡耀邦1980年会见南斯拉夫记者时估计的1亿左右（引自美国《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日报道），但在更为惊人的人口大数前，在此外的6亿或7亿人那里，他们仍不构成全部。他们要做的是理解、沟通、说服以及协调共进，不是强加于人和视而不见，满足于悲情的自产自销，成为另一个祥林嫂。

祥林嫂的启示在于：如果拿不出一一种说服力强和需求面广的共识性批判，一味诉苦就只是对自己苦难的辜负。

□ 原载《观察者网》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